

# 面向21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

——●许心礼——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0多年来,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经贸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发展中日长期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稳定和各国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展望21世纪,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两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将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回顾

中日贸易要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不论从历史上还是地理环境上看,日本对华贸易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占日本对外贸易额的第一、二位。战后,由于种种原因,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但自1972年恢复邦交后,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已从1972年的11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197亿美元,增长达17倍,日本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89年中国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和日本暂停对华日元贷款,中国实施治理整顿和适度调整进口措施等,致使中日贸易下降,特别是日本对华出口有较大幅度下降。根据日方统计,1990年两国贸易额为18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7.5%,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6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28%,进口增加8.1%,达120.5亿美元,日方逆差59.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中日贸易额为165.8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3.9%,中国出口8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从日本进口75.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27.9%,中国顺差约14亿美元。两国统计数字出现差异,是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所致,即日本从转口贸易中进口的中国货也算在中国出口帐上。尽管如此,中国对日出口有所增加而日本对华出口下滑这是事实,在日本的出口贸易中,中国已退居第七位,而在进口贸易中,中国已居第四位。但中日贸易环境正在改善,特别是1990年12月续签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第三次日元贷款的实施以及1991年3月政府间中日贸易委员会的召开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恢复对华贷款等,中国从日本的进口正在增加,中日贸易出现了逐步恢复的好势头。

自1978年中国实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日经济合作形式多样、领域广泛、数额日益扩大。目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有政府贷款、资源开发合作贷款、无偿贷款、直接投资、技术合作以及其他形式(如发行债券、银行信贷、延期付款等),一般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1989年中国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日方碍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曾中止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对华的第三批8100亿日元贷款。在各国对华限制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在去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首相率先决定恢复对中国的贷款。1980—1983年为止的第一批日元贷款主要针对铁路、港口设施等,总额为3309亿日

元；第二批（1984—1989年）主要对运输、通讯、能源等16个项目的贷款，总额4700亿日元；第三批（1990—1995年）对42个项目的贷款总额达8100亿日元。这些贷款都是长期低息的优惠贷款。

资源开发合作主要对中国进行石油和煤炭的开发贷款。技术合作到1990年止，中日累计达18个项目的合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截至1991年3月止，累计达859个项目，金额达28亿美元，远落后于港澳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而且投资制造业比重低，大型项目少，投资类型以合资较多，独资较少。

## 二、发展中日经贸合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影响中日经贸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应该克服不利因素，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合作而努力。以下就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 （一）中日贸易有所起伏，时而出现不平衡。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但时而出现不平衡。复交至今的20年中，中方出现逆差达15年。造成我国长期处于逆差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首先，日方对中国丝绸、中成药和煤炭的进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中国丝绸对日出口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在中日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973年中国对日出口生丝和丝绸达2.4亿美元，占当年中日进出口贸易的12.2%。但自1976年日本采取限制生丝进口政策后，对日生丝出口剧减，1985年下降到7700万美元，比1973年减少68%。又如中国中成药在日本历来受到消费者欢迎，但日本一直以严格的卫生检疫制度限制我国中成药进口。中国煤炭丰富、品质优良，但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煤炭也不积极，仅占日本煤炭进口的4%。其次，在主观上，由于我国进口宏观失控，从日本重复引进。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达40%以上，而且成品出口也以中低档为多，拳头产品不多，产品升级换代缓慢，款色、质量、包装、交货期以及售后服务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出口货源不稳，适销对路货源不足等，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对日出口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初级产品价格疲软，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创汇收入。

近两年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增长超过了从日本进口的增长，中国对日贸易出现较大顺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结构适应了日本市场的需要。另外由于日元升值和产业结构调整，日本的进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矿物性燃料进口比重下降，成品进口比重上升。1985年日本矿物燃料进口占总进口的43.1%，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下降为20%和24%；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则从1985年的31%上升到1990年的50.3%，5年间上升19个百分点。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正是适应了日本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如矿物燃料在1985年占中国对日本出口的46.4%，1990年只占24.7%；而制成品对日本出口额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27%上升到1990年的50.8%。其他如纺织、机电、轻工产品对日本出口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纺织品已成为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要占中国对日本出口的22%以上。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证明中日贸易的互补性正在加强。相互发展两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互利贸易，正是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近两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之所以下滑，首先是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相对削弱。1990年日本出口仅比上年增长4.3%，而1988年出口增长达15.6%。

其次，由于日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将一些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增加了一些传统产业产品的进口。同时，日本还采取了扩大内需型的战略，开放国内市场，使进口激增。1989年日本进口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1990年更增至234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德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第三，1989年中国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日本参与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直接影响日本企业对华出口。此外，中国进行治理整顿，压缩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压缩了进口，这对中日贸易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日贸易在短期内出现一些不平衡，乃是正常的现象。压缩进口当然不是积极的平衡，今后应该从扩大双方的贸易中取得积极的平衡。

(二) 日本对华投资持谨慎态度，步子不大。

8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1980—1989年平均每年以22.4%速度增长，1986、1987、1988和1989年连续突破了200亿美元、300亿美元、4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的大关。1989年高达675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500亿美元。投资布局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拉美，而对亚洲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东盟和亚洲“四小”，对华直接投资虽有所增长，但数额偏低，步子不大。以1988年为例，日本对香港、泰国、新加坡、印尼、南朝鲜、马来西亚、台湾的投资分别达16.62亿美元、8.59亿美元、7.47亿美元、5.86亿美元、4.83亿美元、3.87亿美元和3.72亿美元，而对华投资只有2.96亿美元，排列在第八位，这和有11亿人口的大市场和辽阔土地、丰富资源的大国来讲是很不相称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外国对华投资的8.1%，而且进度缓慢。

日本企业家担心向中国多投资会产生所谓“飞标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中国经济发展后会进一步压缩进口需求，甚至挤占日本国内外市场，无疑为自己树立竞争对手，得不偿失。因此对华投资始终抱有疑虑，态度谨慎。在已经来华的投资中，也以周转快、收益大的企业或服务业为多，对生产型特别是高技术生产型企业的投资较少，疑虑更大。如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在瑞士迅达与上海、北京电梯厂合营7年、美国奥梯斯与天津电梯厂合营4年后，为了挤占中国市场才与上海长城电梯厂合营。1989年中国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日本对华投资消极论更有所抬头，没有出现对华大型投资和技术转让项目。去年苏联八月事件后，不少资金北上苏联或东欧，而对华投资大多数企业处于观望之中。日本财界不少人主张在官方发展援助的框架中开展对华贸易与投资，即日本企业界尽可能围绕着政府发展援助的项目进行贸易和投资，以减少风险系数。

日本企业家担心的所谓“飞标效应”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南朝鲜和台湾省被认为是“飞标效应”的典型，但这两个地区同日本的贸易在整体上看也是进大于出，如南朝鲜每年对日本贸易逆差达50亿美元以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日本的技术层次相比，在总体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大国，要满足十几亿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注重于国内市场，出口主要是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和进口更多的资本货物，因此担心中国的“飞标效应”完全是多余的。

日本企业家还担心中国的政局，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这是对中国缺乏了解和分析，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已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不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改革、开放政策决不会改变，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国政局稳定程度的国际评价是良好的，全国人民一心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所以，日

本企业家对中国政局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有些日本企业家还认为中国的市场不能确保制造业企业所需原料和零部件供应，而且基础设施落后、投资法规不全、投资环境不够理想以及中国强调外资出口义务等，对来华投资能否获得收益仍有疑虑。关于以上这些不足，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进和完善。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公布了许多优惠的法规。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上海市府在前年就制订并公布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鼓励外商投资与减征免征税收、外商投资企业审批、保税区管理等9个总体性的政策法规。外商在上海浦东投资的优惠政策，可以说是汇集了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的总和，并且有些政策比特区还优惠，如可以在新区设立零售业等第三产业，可以在保税区从事转口贸易或进出口代理业务等。国际上已经公认：上海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把投资环境搞得更好，欢迎更多的日本企业家来华投资。

### 三、展望21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

展望21世纪，中日两国进行经贸合作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广阔的前途。

(一)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20年来，经贸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中日双方领导和有识之士在指导思想上都已认识到，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双方都有着展望21世纪朝着向前看的姿态来协调中日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相互了解，已确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为两国开拓经贸合作打下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二) 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已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在中日合资、合作企业中，中日双方配合默契而效益卓著的例子很多。日本财界对华投资的疑虑已逐步消除，加强了对华投资的安全感，对华投资步伐加快。1991年是日本对华投资比较多的一年，日本在上海的投资已超过美国而仅次于港澳居第二位，而且不少大企业和高技术产业已纷纷来华投资，中日经济合作正向纵深发展。

(三) 展望21世纪，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拥有生产要素和自然禀赋不同，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这种互补性效果特别大，持续时间长，在其它地区也是不多见的。中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地大物博，资源和劳动力相对丰富，而且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出现消费高级化、多样化的倾向，展望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星罗棋布的乡镇中小企业、多层次的技术水平和多种类的产品结构，这与日本企业进行专业化协作和国际分工的弹性很大，既可进行垂直型分工，也可进行水平型分工。这对日本缺乏资源、劳动力和开拓对华出口市场有着巨大的吸附力。

经过80年代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得到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新兴工业有所发展。中国今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90年代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能源、交通、邮电、港口以及重要原材料工业要集中力量搞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在加工工业方面着重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为日本提供了向中国出口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21世纪的中日经济合作打下扎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中国已引进了1000多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据不完全统计，仅1984年到1988年普查范围内的进口设备便有各类引进项目2.1万个，分布在75个行业和全国各省、市。通过引进提高了中国产品档次，并向国际化、标准化方向靠拢，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这

不仅将使未来的中日经济合作范围扩大，而且将从初级的合作层次向高级的合作层次转变。

（四）展望21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提高。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将比1980年翻两番，达到31000亿元，上升到世界第5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断深化，并初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开发、开放浦东就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跨世纪工程，开放地区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一步辐射。搞活大中型企业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标志着以上海为首的一批大城市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企业的活力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加强，投资环境更为完善，这就使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21世纪初，中国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但缺乏足够的资金。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到1990年9月底，日本拥有的国际银行资本已占国际银行资本总额的36%。世界上10家最大银行中有9家是日本银行。自1985年起，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估计到2000年的净资产将达1万亿美元。日本对外经济援助也已超过美国，1988年就达10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对日本政府来说，应该利用其资金优势继续以提供日元贷款的形式，对中国的能源、交通、港口等建设给予支持；同时也应为中国金融机构在日本筹资给予方便。中国在日本筹措资金多次发行的债券，信誉良好，迄今未发现过任何问题。日本各大证券公司也都表示，今后也决不会发生问题。中国在1990年的外债总额为46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低于外债总额的20%，中长期外债与出口额的比例，即外债偿还率仅10%，大大低于危险标准25%的水平，与泰国（22%）、马来西亚（23%）、印尼（40%）、菲律宾（32%）相比，中国外债偿还问题情况是好的，向中国贷款也是最安全保险的。对日本财界来说，不应急功近利，而应从长计议，也要展望21世纪，在资金和技术上协助中国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中日加强技术合作，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档次和扩大商品出口，也可使日本所需的一部分零部件在中国生产，这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降低成本、增强出口竞争能力也是有好处的。

（五）展望21世纪，中日经济还可在区域经中发挥积极作用。“亚太经济合作圈”正在走出空泛议论而进入实质阶段。亚太经济合作圈与欧共体有所不同。前者是无形的、松散的，是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即所谓产业间国际分工和产业内国际分工两种形式）逐步形成的资金、技术、商品、劳务相互交流的经济实体。其基本特点是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日本在亚太地区在经济和技术上居领先地位，亚洲各国则处于既想通过亚太经济合作得到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又怕被日本吃掉的两难境地。而中日在区域经中加强合作，既可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同亚洲各国搞好联合，又可发挥中国在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协调机制作用，使中国成为既是亚太经济的稳定因素，又是亚太经济合作的推动力量。中日在亚太区域经中合作的加强，不仅能使这一区域经合作得到健康的发展，也可使日本从中得到实惠，并有助于缓解日益激化的日美、日欧经济矛盾。

展望21世纪，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这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且能为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